

主编 冯毓云 罗振亚
副主编 黄光伟 汪树东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 汪树东
副主编 宋扬 董秀丽

◎ 儿童文学卷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主编 冯毓云 罗振亚
副主编 黄光伟 汪树东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 汪树东
副主编 宋扬 董秀丽

◎ 儿童文学卷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 / 冯毓云, 罗振亚主编; 汪树东分册主编.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317 - 2444 - 5

I. 龙… II. ①冯…②罗…③汪…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黑龙江省—当代 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35 ②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4128 号

书 名: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

主 编: 冯毓云 罗振亚

本卷主编: 汪树东

责任编辑: 宋玉成 刘 薇

装帧设计: 林红红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8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0 元 (全套 11 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2444 - 5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

1946—2005

顾问委员会

张成义 李延芝 衣俊卿
孙 尧 冯建福 李曙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冯毓云 罗振亚
副主编：黄光伟 汪树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波 韦健玮
冯毓云 乔焕江
李 琦 汪树东
罗振亚 姜哲军
郭 力 郭崇林
徐志伟 黄光伟
崔修建



本文学大系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
五”重点规划项目（04—A0027）、黑龙江
省科技厅计划攻关项目（GC5D411）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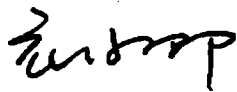
总 序

白山黑水、平原林海架构的北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理应有大的文学家崛起。事实上，龙江文学在建国之后也的确出现过辉煌的历史，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龙江文学更是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影响渐远。文坛上新人辈出，佳作迭涌，题材繁复，手法多元，艺术品位高，呈现出了一派热闹喧腾的繁荣景观。作家、诗人们的名字频繁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龙江文学彻底走出了边远省份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对于龙江文学这种繁荣的现实，龙江评论界曾经做出过许多积极的反应，只是尚不十分及时，已有的一些作品选本，从规模和体裁上还不能完全反映龙江当代文学的成就。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在冯毓云、罗振亚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历时五载，筚路蓝缕，适时地编选了这套大型丛书《龙江当代文学大系》。此前，冯毓云和罗振亚两位教授主持的《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对总结黑龙江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繁荣黑龙江文学创作和评论，就发挥了比较直接的有效的作用，评论界和社会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于二〇〇四年获得黑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大系的编选，是他们有关黑龙江文学研究系统工程的一部分，这一举措较好地实现了编选者的初衷。

编辑《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这项学术工程，具有填补空白的拓荒意义，在黑龙江省还是第一次。它规模宏大，架构科学，具体分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文学卷、理论与批评卷、报告文学卷、儿童文学卷、曲艺戏曲卷、翻译文学卷、影视文学卷、民间文学卷等，凡十一卷，八百余万字。每卷前设有万字左右的序言，对该卷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概述及评价。在具体作品编选时，编选者们秉承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标准，从龙江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仔细搜集、甄别、遴选，然后再通过多人集思广益，比较、讨论后定夺。这样的选编方式，避免了那种一人独断的做法，既能够清晰地体现龙江当代文学的历史脉动，又具有了权威性、实用性和客观性的特点。这套大系的编选，是对即将丢失、荒废的龙江文学资料的及时“抢救”，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它对建设边疆文化大省、强省

至关重要，意义深远。它不仅可以向外宣传、介绍龙江的当代文学，开阔文学爱好者的学术视野，为将来学术界撰写科学、厚重、客观、实事求是的龙江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做必要的学术积累和阶段性的准备。而且还能够打破龙江评论界的寂寞，改变龙江当代文学被低估的状况，回顾龙江当代文学的辉煌历史，总结龙江文学在新时期崛起的经验，确立龙江当代文学在全国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和地位，为进一步繁荣龙江当代文学提供创作和理论上的参照。

期待着《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的配套工程成果《龙江当代文学史》早日面世，我相信它的面世，将会为龙江文化界再次输送新的精品和力作，带来新的惊喜和震撼。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Zhang' followed by some stylized characters, possibly 'Zhang' or 'Zhang'.

大系导言

文学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曾经精辟地指出：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是决定文学发展的三要素。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充分证明，和不断流转的时代风云比较，地域因素和种族因素一样，对文学灵魂的塑造更为持久，更为内在，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像俗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亦养一方文学。

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去透视龙江文学，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和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相比，龙江地处边塞，因为开发的历史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并且其写作命运时常会遭受到来自文学内外因素的重重遮蔽。在一些所谓的文人雅士看来，龙江这片圣人没有走过的蛮荒之地，在古代社会压根就没产生过什么像样的文学，少有的一点民间积累显得鸡零狗碎，难登大雅之堂。就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龙江也始终处于文学的边缘。不论怎么说，这种判断是一种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是一种偏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

事实上，龙江又是一片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土地，这里大约五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自古以来就集居了满、汉、回、蒙古、锡伯、赫哲、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十几个民族，至唐代的渤海国和之后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其文化的建设已粗具规模。也就是说，龙江的地域风貌、历史文化特质和黑土生命力的奔突，决定龙江很早即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还几度出现过繁荣的文学时代。抛却流布久远的《秃尾巴老李》、《伊玛堪》（赫哲族）、《摩苏昆》（鄂伦春族）等大量传说、故事、童话、歌谣之类的民间文学不计，即使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人创作，远在清代就有吴兆骞、张缙彦等人的流人诗歌崛起。到了现代时段，“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骆宾基、舒群和沦陷区作家金剑啸、陈隄、关沫南等人凄切而刚劲的歌唱，已在全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守成期里，周立波、曲波、乌·白辛、郑加真、林子等异地作家的汇入则带来了短暂的兴盛，一些小说、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的创作以及俄苏文学的翻译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曲波的《林海雪原》，孙幼忱的《“小伞兵”与“小刺猬”》，林予的《大雁北飞》，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作品，或以宏阔的史诗气魄，或以机智大胆的梦想，或以神秘的传奇色泽，或以鲜活的民族风味，吸引了众多青睐的目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来自黑土地自身的文化孕育，一方面也和中原文化的融入，包括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外力刺激有关。即便是历史重负最为严峻的“文革”时期，张抗抗、郭先红等一批作家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精神探索，以不无缺陷痕迹的作品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档案。

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龙江文学更进入了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不但作家辈出，阵营壮观，远有关沫南、曲波、林予、鲁琪、巴波、丛深、梁南、满锐、谢树、平青、程树榛、李锡胤等笔耕在先，中有门瑞瑜、王毅、刘亚舟、张抗抗、贾宏图、林子、蒋巍、刘畅园、王忠瑜、吴宝三、黄益庸、江南尘等紧随其后，近有阿成、庞壮国、杨利民、杨宝琛、王立纯、李琦、张雅文、马合省、张曙光、韩乃寅、梁国伟、张景超、冯毓云等中坚坚持，后有迟子建、常新港、全勇先、鲍十、潘洗尘、张爱华、罗振亚、艾苓、高方等“新生代”崛起，短短三十年间差不多是四代同堂，交相辉映……作家们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影视剧、广播剧、民间文学、翻译文学乃至文学理论与评论领域，都纷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姚黄魏紫、千花竞妍的创作格局。纯文学、主旋律、消费性的作品几分天下，众语喧哗，题材阔达，手法繁复，传统的文学魅力依旧，一批先行者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经验，写下了许多极具创新活力的作品。特别可喜的是，龙江文学在这一时段的影响光束愈发强劲，并已逐渐超越龙江的天地，而辐射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那轰动一时的“黑龙江现象”令人颇为感奋，先是有“北大荒的小说新疆诗”的美誉，继而“北部戏剧”火爆京城，再则“黑土诗派”冲击全国。特别是一些作家、诗人不断地打造精品，使自己的名字频频在各项国家级评奖中闪光。他们或在优秀文学作品获奖名单上榜上有名，如林子的《给他》、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阿成的《年关六赋》、蒋巍与贾宏图的《大洋的此岸与彼岸》；或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一举夺魁，如陈玉谦和曲晓平的《蛙鸣》、杨立民的《特殊故事》、据龙秀梅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燃烧的烛光》；或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统领风骚，如阿成的《赵一曼女士》、张抗抗的《张抗抗散文集》，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世界上所有

的夜晚》连续三次蝉联殊荣，国内仅有；或问鼎全国一些单项奖，如中流的散文集《爱的微笑》获少数民族“骏马奖”，杨利民的《地质师》获全国曹禺剧作奖，张抗抗长篇小说《作女》获中国女性文学奖，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常新港的长篇小说《男孩无羁，女孩不哭》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李琦获首届茶花杯艾青诗歌奖，韩乃寅的长篇小说《岁月》获丁玲文学一等奖；或捧得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奖，如张雅文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李琦的《最初的天空》、葛均义的《浮世》、马合省的《永远的人》、周树山的《生为王侯》、董谦的《荒界》、王立纯的《苍山神话》……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和闪光的作品，和众多勤勉耕耘的写作者一道，共同支撑起了龙江新时期绚烂的文学星空，改变了龙江这个偏远的文学省份被人小觑的历史境遇，“北大荒”的文学彻底告别了“荒凉”。

那种以为在文学的发展历史上，今天的文学必然优秀于昨天的文学、而明天的文学必然优秀于今天的文学的线性时间观念是靠不住的。从上述的简单回望中可以看出，龙江当代文学的步履在进入一九四九年后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它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命运一样，经历了很多的反复和颠簸，可喜的是它始终以螺旋式的上升姿态坚韧地前行，并且早已跨过“五十而知天命”之年渐近花甲。半个多世纪的龙江文学尽管呈现着变动不居的开放状态，多元化的探索走向纷繁多端，加之离当下过于迫近、尚未定型，很难做出全面的史的整合和归纳，但它在发展中还是凸显出了自身赖以独立、引人注目的几种恒定性的艺术追求或成就。

首先是在注意地域维度同时注意时代维度，实现了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谐和统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龙江作家寻找到了恰切的理论支点，那就是他们确信走向地域的尝试，是其立足于世的前提，抵达辉煌的最佳途径。那种抛开地域文化背景，希冀通过中国、世界景观的观照征服读者的意念，只是一种浅薄的幻想，所以他们纷纷自觉以地域性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因子的挖掘，从形到质地走近“北大荒”，使自己的创作烙印上鲜明的地方性特点。有的作品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王毅的龙江剧《皇亲国戚》中二凤的一段唱词，“天有多么朗，月有多么亮，风也爽，花儿香，大柳树，长又长，荷花长出了小池塘，‘扑刺刺’蹦出来一对戏水的鸳鸯”，在东北地方母语的基础上承继、吸收了东北民间艺术形式“二人转”的语言和腔调，并因之而使方言的运用乡

情浓郁又幽默活泼，把南方县太爷家的小姐完全东北化、农村化、土化了。更多作品的地域性则表现为对当地特有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像龙江文学中涉猎的狩猎捕鱼、开荒放牧、挖参采矿等题材，乃是其他省份的文学中所少见的，并且其人物塑造也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如在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里，杨子荣、座山雕等人物固然栩栩如生，几近妇孺皆知，但威虎山一带的崇山峻岭和浩浩林海等开阔深邃的东北自然风光，对南方的读者更具诱惑力，剿匪的传奇故事和传统章回体的结合，保证了其在读者中的喜闻乐见。林予的电影剧本《大雁北飞》，写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火热生产和生活画面，对建三江一带的农村尤其是寂寞而丰饶的雁窝岛的自然环境、地方习俗的描写，和北大荒人团结协作的奋斗精神相得益彰，乡土气扑鼻。阿成善于以现代化的手法表现古老中国的都市故事，其小说《年关六赋》、《良娼》等作品虽然都具有强烈的文体审美意识，文风散淡，语气鲜活，感性的生命细节和人性的深邃挖掘交织，但描写的却无不是地道的老哈尔滨，具体说是老道里、老道外、老南岗一带的市民生活，洋溢着浓郁的文化色彩。至于迟子建仿佛已把大兴安岭当作了自己创作不竭的生命之泉，《额尔古纳河右岸》、《雾月牛栏》、《亲亲土豆》、《沉睡的大固其固》等风情小说在人性主题的细敏传达中，都因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婚丧嫁娶、节庆礼仪、服饰饮食等因素的介入，而更具地方风味。像《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和杨利民《黑色的玫瑰》中的黑燕、梁南诗歌的抒情主体一样，心态一如龙江的森林、原野般宽阔，重义轻利，刚毅果敢，一改女性传统的柔弱，带着男儿的粗豪和血气。

龙江文学的优长在于，它注重地域观念，但没有把鲁迅倡导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理论作为唯一的探索取向，去遮蔽或窒息其他的多元观照视角。因为作家们深知，仅仅为北方的自然和历史涂彩画像是容易而肤浅的，它充其量只能提供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弄不好就会蹈向思古幽情抒发、简单无为透视的民间文学陷阱，最终淡化或弱化文学和时代、现实的紧密联系，造成影响和轰动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他们都力争不仅做匍匐于地面的“兽”，还要做能够超离地面、在天空中飞翔的“鹰”，立足于黑土地，在向地域挖掘同时又注重当代意识维度的介入及其二者之间的结合，走出地域，做更高远的心灵瞩望和情思拓展。如杨利民的《地质师》、王忠瑜的《赵尚志》、滕贞甫的《远东第一犬》、迟子建的《雾月牛

栏》、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鲍十的《我的父亲母亲》、李琦的北大荒女人系列诗，都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传达缤纷的人生故事与心灵的多元意绪，地方风味浓郁。但是当代意识的烛照与作家主体的投注，又使它们去掉了“北大荒”中与原始、野性、蛮荒连在一起的“荒”味儿，超越了铺排民俗、罗列事象的精神浅滩。它们或凸现了北方的热情、坦诚、粗犷的灵魂，或灌注了强劲的创业精神，或充溢着人道主义、英雄主义情怀，或兼具地域色调与人性的深度。应该说，文学作品地域性获得的决定性因素，乃在于能否塑造出具有独特地方性格和文化心理的人物形象，这几乎成了所有龙江作家的共识。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又回过头来改变、创造自然，这就是文化。每个人都置身于文化的场之中，他能够最集中地体现自己民族地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心理素质和思想情感。获得这种认识后，作家们在作品中自然注意打造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格的人物，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摩尔人”王志刚即十分典型。生性孤僻的他在生死考验面前，把生的机会让给“情敌”，手持板斧和群狼搏斗，最终献身。且不说他开发“满盖荒原”背景的荒谬，单是他的粗犷坚定、慷慨仗义、从容大度、豪爽果敢、勇于牺牲的性格，就有力地彰显着当年知识青年为追求理想而勇于牺牲的英雄品格，体现了北大荒悲壮雄浑的精神内蕴。《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黄罍粟》中的“老司头”也都是东北人质朴豪爽、热情粗犷的秉性精神的体现者，在他们身上又都深深地烙印着时代和作家情感评价的痕迹。再如李琦的诗歌《白菊》，“贞洁的花朵/像一只静卧的鸟/它不飞走是因为它作为花/只能在枝头飞翔……开放/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从荣到枯/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全诗虽然观照的是北国的一种花卉，但诗人却借助主体的移情，神游白菊形、质组构成的世界时，情同物融，使白菊不再是死的异己自然物，而外化为热烈单纯的灵魂奥秘的载体，白菊既是自然之白菊，又成了人生之白菊，她那份贞洁、单纯与热烈，不论在店堂中央还是在安静角落都要倔强开放的品格，正是生性高洁的诗人精神情怀的外化与写照，从而使诗超越了具象，裸露出隐伏在物象、细节背后的理性晶体。屈兴岐的《歌·酒·号子》写的是林区生活中最具北方气息、最为平凡、给人印象最深的歌、酒、号子，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作为劳动者的自豪、喜悦，在往昔热火朝天的创业生活的追忆和书写中，触摸到了人性当中最柔软最普遍的共同情

感，轻盈的走笔里自有一股撼人的力量。

其次是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为主体同时又不乏新鲜艺术气息、传统与现代平衡的文学格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龙江的儿女大多都是从齐鲁燕赵等地迁徙而来，中原儒家文化的传统制约，决定了这里的北方人不同于南方人的浪漫灵动，而更多质朴和实际，严酷、冷峻又神秘的生存环境，使他们虽然心中不时有幻想闪回，但其视角多倾向于具体质感的“此在”世界空间，执著人生，关注现实。因此现实主义构成了这块土地上文学的主旋律和流行色，构成了这块土地上最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形态。说起现实主义，它到底是一种创作方法、创作原则，还是一种创作精神、创作流派？我们以为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应该是作家审美地把握、认识、解释和表现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美学形态。从这一标准考察就会发现，尽管在半个多世纪里龙江文学的具体作品形态不断变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操作也存着在一些误区，但至少在理论倡导上一直推崇和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一直在当时理解的现实主义大潮之下谋求存在、发展和创新。新时期后在获得现实主义精神复归的同时，龙江文学创作中又出现了许多非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但它们都可视为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开放性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国以来龙江大地每个时段的历史风云和时代变迁，在作家们的作品中均有对位的回应，鲁秀珍的往昔“眷顾”，梁南的“苦恋”情结，丛深的电影《徐秋影案件》、《娘子军》对反题材或社会主义建设中“女性”的凝眸，乌·白辛在戏剧《赫哲人的婚礼》中对赫哲民族魂的深入“勘察”，张抗抗《爱的权力》、《隐形伴侣》凸现的“问题”，贾宏图对切合时代脉音的现实“风景”撷取，王立纯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无不体现着这一现实主义的总趋势。龙江文学这种主题、思维取向的方式，决定了它在艺术范型上更接近传统，不论是孙少山的煤矿视域、林予垦荒书写，还是杨宝琛的荒蛮背景上的创业者颂歌、鲁琪系列剧本的“伤痕”抚摸，抑或是张雅文的《越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杏儿的命运展示、李克异《一片归心》的乡愁涌动，都以“故事”取胜，事态的铺展都仍然隶属于逻辑性架构，尽管它们在立体感的强化、心灵的纵深挖掘与情节的波澜运作上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即便像刘宾雁首开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先河的《人妖之间》，吸引读者眼球的仍然是传统的“事件”，它让作家的“手术刀”对准了社会毒瘤——贪污腐败，通过黑龙江

省宾县粗鄙、浅薄的“女强人”王守信在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冷静书写，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体制等困扰中国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和心忧天下的可贵情怀，尖锐犀利，振聋发聩。

同时移民文化结构又赋予了龙江当代文学一种开放性的发生发展机制，使其颇多现代的艺术气息。必须承认，龙江文学的主体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学。尽管在龙江的历史上本土文学源远流长，但它和移民文学比较起来始终只是涓涓细流。从金代扣留使金人才又礼遇降金知识分子的“借才异代”，到清代吴兆骞、张缙彦等大批关内上层官吏和知识分子的被贬谪流放，山东、河北大批百姓为求生存的“闯关东”，再到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众多文艺工作者的转入、五十年代十万转业官兵的北大荒开发造田、“文革”中四十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一批批“外来者”带来的中原文化，和黑土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农垦文化，加上俄侨欧化文化的南北汇聚，中外合糅，使龙江理所当然地成为多民族、多层次的文化包融、混杂所在，移民文化色彩异常明显。这种移民文化，决定了这里的作家们不愿意那样循规蹈矩，畏畏缩缩，而是更多开放的气度，它和蜂拥而入的关内、西方的艺术潮流遇合，从一开始就使龙江文学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前提下，艺术上自由创新，为文本空间吹送进一股现代的审美信风。还在一九五〇年代，乌·白辛的《赫哲人的婚礼》就在结构上尝试突破时空界线，把作为剧情引线的赫哲人说唱艺术“伊玛堪”和“回叙”、“闪回”等新颖手法结合，令人耳目一新；李琦的《雪花飞舞事与人》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跳转，它从雪花的飞舞领起，把历史的、现实的、亲近的、陌生的等有关冬天和雪的人物、事象遣诸笔端，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更实现了文体的革命，舒缓动情的笔调，天、地、人之间的谐和，和温暖的人性故事浑然一体，熨帖自然，唯美而感伤，仿佛天籁的音乐，又仿佛是纯粹的诗。再如孙少山《八百米深处》对意识和潜意识世界的感觉化深拓，桑克在诗歌《夜景》思想行旅中的形而上叩问，以及梁南、庞壮国诗歌的系列私人化象征，李英杰的剧本《黑三角》中画面的隐喻和象征，梁国伟在剧本《欲望的旅程》中对“间离”手法的运用，张曙光的《1965年》诗歌“叙事化”和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等散文诗化的“文体互渗融合”，都纷纷以陌生化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俗常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成功嫁接，增加了文本的审美蕴涵与艺术魅力。虽然说我们龙江文学中没有出现像马原、洪峰那种纯

形式化的先锋探索，但在艺术上并不落伍，而始终是和全国文学同步，保持着思想和艺术、传统和现代间的平衡。

再次是龙江文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一方面以阳刚为主体风格，一方面又出现了多元化的个人艺术风貌，二者“和平共处”，并行不悖。龙江以白山黑水、林海雪野为主要构架的地理风貌，和关内各省比较相对短暂、冷峻的文化历史，以及它们在人们心里的投影和情感反馈，规定了龙江文坛常常饱蕴着充满阳刚之气的“力”之美，所以北方的豪放、阔达、神奇的雄风，从当年东北作家群的悲壮歌吟，中经四五十年代《暴风骤雨》和《林海雪原》粗犷的解放呐喊、八九十年代杨宝琛和梁晓声等人的高迈人性探询，一直流贯到今天。如一九五〇年代袁木、范荣康的报告文学《大庆精神大庆人》就张扬着时代需要的刚性精神。其中的钻井队长马德仁、采油队长薛国邦、工程队长朱洪昌和通讯工人毛孝忠等组构成的英雄群像，为了工程建设和国家利益，的确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敢于跳下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不怕疼痛让焊工在自己用双手捂住管道裂缝的手边焊接，甚至用身体链接断了的电话线以维持紧急电话畅通。整个作品在残酷的自然和生活环境之上，凜然旋起的是一种力和男性风暴，是一种令人敬仰的牺牲奉献精神，它让人们窥见了北国人粗犷、强悍、坚毅的灵魂内核和精神硬度。如果说《大庆精神大庆人》呈现着精神之“力”，那么庞壮国的诗歌《关东第十二月》和韩乃寅的小说《岁月》则体现出艺术上的硬度。前者的结构大开大合，壮阔粗放的景观，稳健活泼的风格和北方的性格达成了完美的契合。

后者“在大酱缸”（沼泽）、“大烟炮”（风雪）、大农场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之上，把垦荒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创业精神激发得阳刚火暴，人物棱角分明，情节起落舒放，大气磅礴，厚重而沉雄，语言的硬朗爽直、掷地有声也非小桥流水、精雕细琢的南方能够比拟的。

但是龙江毕竟族群杂居，文化斑斓，是自然环境在雄壮外不乏娇丽与柔婉的所在，这些和纷繁的作家个体、龙江开放的胸襟结合，又使龙江文学构成了多元化的个人创作奇观，每一个成熟的作家既有和龙江文学主体风格谐调的一面，又都拥有一颗自己的个性的太阳。这也可以视为龙江当代文学成就的一个表现和标志。如李克异、关沫南的小说多着力渲染浓烈的北方气息，林予、韩乃寅的主要剧作常进行创业精神的弘扬，张爱华的散文一般是以人、事、物为依托进行思想漫游，曲波的小说在地域背景之

上多有传奇色彩，乌·白辛的剧本充满奇异的民族风味，孙幼忱的作品以儿童文学的生动形式阐发人生哲理、启动人们的探索精神，张抗抗的小说一直恪守女性的立场进行跨题材写作，阿成的小说致力于地域与人生关联点的寻找，李琦的诗歌始终坚持纯洁纯粹的理想，梁南的诗歌昭示了苦难又悲壮的情怀，师胜杰的相声充满向上精神的同时兼具娱乐性和传统气韵，黄宏的小品构思精巧，语言中带有丰富的社会蕴涵，杨宝琛的戏剧以真切的人间烟火气息夺人，迟子建的小说靠细腻空灵的诗性取胜，贾宏图的报告文学气度恢弘、触角敏锐，杨利民的戏剧则接通了幽默感与思考质，鲍十的小说和剧本善于在黑土文化氛围中营造现代的乡愁体验，张景超的评论总能尖锐地指向文坛的弊端。也许有人会认为龙江主体文学风格的建构和多元化的个体风格之间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们正如滚滚流动的黑龙江和江中的一朵朵浪花的关系一样，是统一的复合体。并且龙江文学正是凭借这种以阳刚为主体的多元化美学风格的建构，凭借这种与黑土地深沉而凝重的灵魂相契合的审美力学的塑造，凭借这种个人化创作奇观的经营，才同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几分天下，获得了走向成功的立身之本，满足了读者丰富的审美需求。

如果把龙江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版图上加以考察，我们就愈会发现它实际上在扮演着不可小视的重要角色。它通过一方水土民俗风情的展示，扩大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疆土，丰富了中华文学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出了读者多样化的期待视野。但这充其量还只是它的表层价值。其深层的意义则在于：“十七年”时期，它的追求精神和阳刚品格吻合了全民族的灵魂脉动，能够赋予读者一种时代需要的向上之力；而处在八九十年代形式主义、唯技巧论甚嚣尘上的文化转型期，它立足现实坚守良知又实行艺术开放、注重深沉遐思与智慧飞升又饱含人生坦待的稳健艺术风度，更是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制约与抗衡，是一处不无启迪意义的“风景”存在。当人文精神沦丧、低迷婉约弥漫为文坛流行色的时节，它以阳刚风格的标举与撩拨，曾经同西部文学一道使文坛雄性勃发，尽得风流，产生过力的强烈震撼。龙江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自觉努力，冲刷了贻害文学的脂粉气与小家子气，避免了浮躁玄虚之风的流行，而今它正在使自己携着“东北虎”的神威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另外它的地方口语、俗语的运用，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言宝库。

当然，龙江文学目前尚无大西北文学那样声势浩大，也没有陕军东征的所向披靡，甚至在它行进的方阵中，还没有产生像萧红似的能标志一种特别文学方位的当代“大手笔”。并且它还存在着许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不少作家文体意识淡漠，在艺术上创新力度不大，一味地用传统手法表现目下现代、后现代的社会历史景观，不热衷于跟风值得肯定，但总也不做先锋的探险，就难免出现艺术上的落伍和表现的错位；各种文体之间发展不够平衡，小说、诗歌、戏剧、广播剧等已在全国领风气之先，而散文创作大都出自非职业作者之手，至今尚无有影响的国家级作家，文学评论领域也由于缺乏群体意识、用力分散，没法和江苏、上海、广东等强劲的省份相比；整个创作队伍也有一定的断裂迹象，大批优秀的作家都出现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而后基本还没产生能够强有力冲击全国文坛的作者。所以龙江文学的创作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北方独标一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少传统重负的北方人又多行动之力和开拓的精神，所以只要作家们不断强化理论素质和知识结构，回归文学本体，增强反省意识，正视贫瘠的现实，培养开放的气度，走出过分追求地域性对文坛走势淡漠的误区，凭着他们扎根黑土的热情，凭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凭着他们的戮力同心，龙江文学完全有可能像龙江在华夏地图上的位置一样成为“鸡头”，或者说产生“北军南下”效应，拥有一个令人钦羡的荣光未来。

总之，龙江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即便和关内一些省份的文学相比，它丝毫不逊色。常言道“五十而知天命”，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大都会拥有一种清醒自知的状态，而有了半个多世纪积累的龙江当代文学，也理应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自己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遗憾的是，面对龙江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前途，龙江评坛并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必须承认，在这一点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不该忘记的拓荒者。如龙江文学界很久以前就萌发出一种可贵的当代文学史料意识，早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〇年，即由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辑，分别在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三套作品选，尤其是带有象征、总结意味的后两套，即《黑龙江三十年文学作品选（1949-1979）》、《黑龙江四十年文学作品选（1949-1989）》，更是勾勒了建国以来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风貌，对了解龙江地域文化、历史现实乃至龙江人的精神世界，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在龙江文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彭放等人几经努力，出版了《北大荒文学艺术》、《黑龙江文学通史》等著作，冯毓云、罗振亚领衔撰写了《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林超然推出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张景超、韦健玮、李福亮等对龙江一些作家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黑龙江省文联的杂志《文艺评论》在八十年代还专门研讨过龙江地域文学。但是这些和龙江文学的历史分量相比仍然远远不够。并且，几套文学作品丛书的规模和气象不大，种类也不甚齐全，长篇小说、曲艺、民间文学、翻译文学等几部分阙如。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已不能满足文学深入发展和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而大量的文学评论者始终心存误区，以为连主攻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家唐弢在世时都提出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研究龙江文学自然就缺少学术性，因而对之不屑一顾。现存的某些评论龙江文章、论文集，也多为平面零散的现象式描述，远未系统深入地揭示出龙江文学的实质内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境况，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为改变龙江评论界寂寞的现实，揭示龙江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其演化规律，评判其得失，指明其方向，也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特别编辑了这套《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编辑大型作品丛书，在我们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否得到了实现，具体实现了多少，尚需读者的指正和评判。

冯毓云 罗振亚